

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合实践与价值刍议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平维彬

(中央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现代主权国家的建立。新中国成立之后并没有随即终结中国边疆地区的“碎片化和异质性”特征, 仍然需要国家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社会动员”等层面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整合的系统性工程。在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框架内, 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维度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强化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国家疆域体系内部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成为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边疆民族地区的整合发展实践, 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边疆整合; 现代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 (2022) 05-0001-07

DOI编号: 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22.05.001

On the Integration Practice and Value of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Border Area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PING Wei-bin

(School of Marxism,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k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sovereign state in China. However,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fragmentation and heterogeneity" of China's border areas did not end immediately. It is still necessary for the state to promote the systematic project of integration in border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ideology,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constructi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modern sovereign country, through the modern governance model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ety", we can strengthen the cohesion and centripetal force of the people in border areas and strengthen the unity and integrity within the national territory.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on in frontier minority areas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frontier minority areas, to build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the Chinese nation for and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Key wo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order integration; Modernization;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收稿日期: 2022-05-02

基金项目: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一般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体系研究”(项目编号: 2021-GMB-006); 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的边疆整合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2022QNPY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 平维彬, 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从事民族理论、边疆理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由全体国民有机组成的“个体”的共同体，也是一个由56个民族有机组成的“集体”的共同体。在国家意义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下，无论是基于政治身份的公民个体，还是基于群体分类的民族集体，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将这种推演方式延伸到“边疆与国家”的关系层面依旧适用，“边疆与国家”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非交叉或其他的任何关系形式。在这种意义上，无论边疆的范围多广、面积多大，它只能是国家疆域体系中具有某些特殊性的个体单元。边疆民族地区作为我国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1]。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边疆治理现代化，不仅构成了国家治理这一循环链条赖以持续运转的物质性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之治理追求在价值层面得以存立的要素补充”^[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同时也是我国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核心要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标志着“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获得解放、人民获得民主权利”，而且实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民族国家形式在中国的建立”，预示着中国开始由传统国家迈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行列^[3]。然而，新中国的建立并没有随即终结脆弱的边疆状态，碎片化的边疆形态仍然需要国家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行动、文化教育、社会动员等各个层面进行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指导下，开启了边疆整合的系统性工程，推动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面的发展，增强边疆与内地联系的密切性，实现中国疆域内部各族人民更为紧密的团结与整合。边疆整合，正是因应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而提出的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之举。有学者指出，“边疆整合是通过国家整合力量来维护和巩固边疆以及增进边疆与内地间的整体性和一体化的过程。”^[4]边疆整合既包含通过‘人’的维

度实现‘地’的整合”的地域整合^[5]，也包含通过“地”的维度实现“人”的整合的社会整合，它是统筹协调边疆人地关系的系统性工程，也是基于“边疆治理现代化”而提出的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二、现代化视阈下新中国边疆整合实践的多重维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过渡基本完成。在主权独立的现代中国，边疆和内地本质相同地构成中国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现代边疆政治讨论的首要前提。在主权国家的政治屋顶下，一方面，国家尊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另一方面，通过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加强疆域体系的整体性。亦即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多重维度的整合式治理方式，增强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提升国家疆域体系内部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进而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命运意识。

（一）政治维度的边疆整合：制度、法治与意识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种崭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包括内地和边疆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开始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从国家根本法意义上确定了“全国各族人民”作为共同体之于国家政权的“统一性”和“主体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解放”和“进步”为目标的革命运动，打破了边疆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与落后性，被动员起来的各族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政治工程中。革命时期“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激发了个人与国家所分享的共同命运感，并在新生政权的制度配给中由国家主导向少数民族优惠分配物质和精神利益，进一步巩固了个人文化身份与国家公民身份的同一结构，强化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6]。

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在从宪法层面强调边疆与内地一体性的同时，还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供给推进边疆与内地社会的整体性发展。这些制度既包括支撑共和国政权建设的基本政治制度，也包括

特别指向边疆地区的“屯垦戍边、对口支援、财政转移支付、边民补贴、军民（警民）共建”^{[7]（P15）}等功能性边疆治理制度。基于推动边疆地区现代化发展的价值追求，稳定性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灵活性的功能性政治制度有机结合，构成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边疆地区政治体系建设的制度基石，体现了国家在边疆地区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同时也是推进边疆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法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哈耶克认为，“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活动应受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制约——这些规则能够使人们明确地预见到在特定情况下政府将如何行使强制力，以便根据这种认知规划个人的事务。”^{[8]（P73）}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边疆作为国家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疆”是依法治国方略在边疆地区的体现，也是我国边疆治理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制度的调整，重新树立了建设“文明边疆、法治边疆、平安边疆、富裕边疆、和谐边疆、美丽边疆”的价值理念，实现边疆善治^{[9]（P266-272）}，更为有效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的边疆整合进程。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制度创新产物，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也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注意到了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并按照苏联经验提出了解决蒙古、新疆、西藏问题的政策主张，但这些主张大都脱离了我国民族情况的具体实际，不具备在中国推行实施的合理性基础。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断成熟，党和政府逐步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国家整合与政权统一的作用有着四层内涵^{[10]（P69）}：第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维护和促进国家主权统一为理念基础；第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单一制国家制度结构的嵌入式部分；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将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能够淡化民族界线和民族隔阂，消解民族对立意识，增进民族间的依赖与互信；第四，民族区域自治机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政权机关。

（二）经济层面的边疆整合：理念、政策与经

济网络

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现代变革，是现代化在经济层面的两个重要表现。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想象中，我们常常把中原地区“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和边疆地区“牧羊放马”的游牧经济区分开来。事实上，这两种经济生产方式都是基于特定的自然气候条件而生成的适应性经济行为模式，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游牧经济的流动性和脆弱性特点，恰恰与农耕经济的固定性和稳定性互为补充，古代的“朝贡贸易”和民间的“茶马互市”“绢马互市”等均体现了这一点。贺卫光指出，“互补性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间关系的基础”^[11]。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普及，传统的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变革与重组。经济的现代化在本质上渴望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与优化组合。因此，边疆和内地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要求更高层次的经济整合。

基于对国家内部的整体性发展和缩小边疆内地经济发展差距的综合考量，国家开始从整体发展的战略层面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平衡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精准扶贫等都是党和国家从宏观层面实施的促进西部与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以西部大开发为例，从某种意义上讲，21世纪初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也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大开发。西部大开发的目的不仅是协调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而且包括促进族际之间的均衡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标志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理念由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12]。为了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13]，重点围绕“创新发展理念、‘一带一路’、生态安全、深化改革、改善民生、政策支持”等方面推出了极富指导意义的36条举措。

统一而高效的经济网络既密切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联系，也促使东部较高的发展效益向边疆地区的流溢。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中国有一个相当聚合的地形。从秦汉形成的道路，经过历代不断地扩大和加密，至今仍是庞大的网络。各地以其特产的聚散，彼此交换，互相谋利。于是，

中国经济上的区间互赖,也是维持中国凝聚为一个整体的重要因素”^{[14](P205)}。为了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国家从整体发展战略层面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平衡边疆和内地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便实现国内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协调发展。得益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网络电商平台的应用、精准扶贫政策的支持,国内经济网络基本建立并不断得到完善。尤其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内统一经济大市场将全国各区域、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产自云南大理的芒果借助现代电商平台,动动手指即可销往全国各地;辽宁丹东的海鲜也可以“乘坐”飞机,数小时内保质保鲜地端上无数家庭的餐桌。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现代经济网络已将边疆和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边疆和內地的经济整合程度会随着经济网的完善不断强化和深化。

(三) 文化层面的边疆整合:教育、认同与国家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5]”。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培养公民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国民教育一直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发展至今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我国是一个有着辽阔边疆地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国家在制定统一教学规范、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时候,也兼顾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因此,国家在符合条件的公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同时,也在民族地区实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相结合的双语教学,并兴办了各个层级的民族学校,保障民族教育事业顺利开展。国家在制定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时,充分考虑并尊重少数民族群众语言和文字的特殊性,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来保障少数民族群众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法律、财政、科技、人才等层面不断加强对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16](P129)}。

现代国民教育是实现人的政治社会化的重要

途径,也是影响族际政治整合重要因素。盖尔纳指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个人的可雇用性、尊严、安全感和自尊取决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他们在其中受教育文化范围,也就是他们在道德和职业方面赖以生存的范围。”^{[17](P48)}国民性和国家认同感的培养,是大多数现代国家在国家建设进程中面临的重要任务。现代国民教育作为培育公民国家认同感、实现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其在培养各民族青少年学生文化知识和社会技能的同时,也对学生进行正式的、系统的、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教育。张会龙在论及族际整合的国民教育机制时提出了国民教育在民族成员的思想教育方面的三种方式:^{[18](P136)}其一,直接的政治教育;其二,知识传授中间接的政治教育;其三,国家统一规范的学校组织的学生活动,比如升旗仪式等。

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流动性极强的现代社会中,个体性获得解放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无法脱离“共同体”而孤独地存在。从现代国家组织结构来看,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早已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共和国内部的各个民族如同共同生活于同一家庭的家庭成员一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将世界划分为主要的八种文明^{[19](P24-26)},是基于“民族-国家”实体而进行的文明分野方式依旧没有脱离“民族-国家”的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以家国情怀、社会关爱和人格修养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召与浸润下,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

(四) 社会层面的边疆整合:交通、流动与社会结构

对于现代国家而言,交通、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就像“血脉、神经网络和骨骼”一样,在国家区域整合和民族整合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交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和基础,人类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交通网络的形成史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史。1949年至今,我国边疆地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日趋完善，交通、通讯、水电、邮政等基础设施渐成体系，边疆社会面貌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电话、互联网等电子通讯，水电、邮政等基础设施，都已初步构成了网络化布局。安东尼·吉登斯在阐明交通通信的发展与民族-国家行政一体化的巩固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时-空融合的概念，尤其是电子通信技术对机械化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得整个国家的行政体系可以被掌控在作为现代组织核心的时-空秩序——时间表之中^{[21][213]}。时间数字化和空间时间化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两大特征，时空压缩和空间距离在时间意义上的缩短，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提供了技术便利。

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和有效配置，激活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随着“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概念的提出并相继建设开通，内地与边疆、边疆与边疆、内地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以我国面积最大的边疆省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新中国建立初期，这里只有简易公路3361公里，而到2014年底，新疆的公路总里程达17.55万公里，基本形成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环绕两大盆地，沟通天山南北、辐射主要地州、东连内地、西出中亚、通达全疆的公路网。铁路的发展更是实现了质和量的双飞跃，从“零”到“一”字形到“人”字形到网状再到建设中的环状铁路，并实现了由“内燃时代”“普速时代”向“电气化时代”“高铁时代”的跨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自治区成立以来，国家已累计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82亿元，建成各类大中型水库538座，总库容达169.08亿立方米，建成大小水厂1315座，解决了1100多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22]。党和政府各种利民工程的部署建设，增强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现代交通的发展实现了社会成员快速地跨区域流动，边疆社会的社会结构也随着人员的快速流动发生着动态性调整。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运输通道的建设，我国边疆地区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更加突出。边疆地位的提升以及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边疆社会基本处在“动态的平衡，流动的稳定”状态。有学者研

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继20世纪90年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又一次引发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结构变迁的制度性因素，它使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加速，族际格局发生变化，形成民族交融的新型族群生活样态”^[23]。在此情况下，国家有意识地引导边疆社会流动的有序性和合理性，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和整合状态，实现边疆社会持续向好的现代化发展。

三、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价值：发展、团结与伟大复兴

边疆是国家疆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推动边疆社会的高效能发展，凝聚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共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全，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皆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改善边疆地区的发展质量：从经济发展到综合进步

整合式的边疆发展是现代主权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推进途径，“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为一组辩证互动的逻辑”^[24]。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层次和发展质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质量的提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后，针对少数民族群众聚居的边疆地区，党和国家实施了多个以“稳边、固边、兴边、富边”为价值导向的战略行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科学人才培育、经济结构改善、发展效益提升”等各方面都彰显着边疆地区朝着更高层次的现代化方向发展，也逐步实现由基于经济数量的“硬性发展”到统筹经济数量质量的“综合发展”的转变。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效凝聚社会发展力量，团结各族人民群众，整合经济社会资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边疆整合作为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体现了“合力治边”^[25]“文化戍边”^[26]“多元治理”“整体治理”^[2]的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方略与方向，推动着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治理能

力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二) 推动民族团结的质量提升：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

基于多民族社会结构现实而进行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塑造，既是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社会路径，也是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转化的有效途径。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既是我国民族现状的一大特征，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优势。费孝通先生指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发挥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继续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发展到更高的层次^[27]。中央政府历来秉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原则，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巩固民族团结大局、维护多民族国家稳定统一是一以贯之的目标^[28]。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打造方面，党和国家所倡导的“互嵌式民族社会结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这同时也显示出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科学性、整体性和系统性。滕尼斯指出，“它们——各个局部——只要参与整体，都是相同的；而只要每一个局部都表示着自身，有它固有的活动，就是不同的，丰富多彩的”^{[29]([249])}。这种表述正与费孝通先生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着相通之处。“多元一体，作为一个历史间之于现实的理论概括和现实描述，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构成的现实情况；而国内各个民族对这个现实的认同程度，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命运，这种事关国家分合与存续的整合认知，又与各民族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30]。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基础上，构建起富含中国传统智慧的“和而不同”式有机团结秩序的伟大实践。

(三)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感性认知到理性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31]这一重大论断。这一时代变局深刻地表现为“大

国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许多不确定性、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人口结构变化复杂深刻、国际货币体系演化、多边体系瓦解与重建、美国内部制度颓势显露和中美博弈加剧”^[32]等诸多维度。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更是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既催化了全球和地区冲突与风险的集聚，也形成了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窗口期^[33]。在这一复杂多变国际背景下，我国各民族、各地区、各行各业更应当团结一心，凝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之下，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奋力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3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到整个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它既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推进的重要保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背景下，只有推动国内“边疆-内地”整合发展，强化国家疆域体系各部分的整体性，才能凝聚各民族、各区域、各行各业的力量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以更加团结、更加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

四、余论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制式作为西方国家主导构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模式渐趋获得支配性地位，但这种模式并未充分考虑西方以外地区的特殊性，非洲和中东地区“横切竖割”的国家版图轮廓显示了殖民时代弱国“任人支配”的随意性。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在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狂虐的殖民战争时代，也数度面临“亡国灭种、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和边疆危机。边疆地区的特殊性经由王朝国家时代向民族国家时代转型之后愈加显现，也几番被帝国主义列强利用，炮制出了“满蒙非中国论”等企图肢解中国的歪理邪说。在主权独立的现代中国，边疆和内地本质相同地构成中国领土疆域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影响，边疆地区的异质特征仍然存在，“一体”和“异质”之间的矛盾在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中被凸显出来^[35]。新中国成

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指导下，开启了边疆整合的系统性工程，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维度增强边疆与内地的整体性，实现中国境内各区域之间更为紧密的团结与整合。边疆作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其现代化进程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边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保障，对于建设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生态良好、人民安康”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边疆，增强边疆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变局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02).
- [2] 青觉,吴鹏.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研究:内涵、价值与路向[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1).
- [3] 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J].学术探索,2009,(6).
- [4] 孙保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边疆整合[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 [5] 孙保全.论中华民族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 [6] 关凯.反思“边疆”概念:文化想象的政治意涵[J].学术月刊,2013,(6).
- [7] 方盛举.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 [8]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9] 孟凡丽,王国宁.边疆民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时代意蕴、面临的挑战及路径选择[J].贵州民族研究,2021,(1).
- [10] 朱金春.现代国家构建视野下的边疆治理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
- [11] 贺卫光.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经济上的互补与非平衡需求[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 [12] 高新才,滕堂伟.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的变迁与完善[J].兰州大学学报,2005,(3).
- [1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518/c419242-31712395.html>,2020-05-18.
- [14] 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 [16] 刘源泉.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 [17] 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 [18] 张会龙.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结构、过程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19]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 [20] 杨柳青,王建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历史逻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
- [21]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广袤边疆大建设促就大发展——财政支持新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J].中国财政,2015,(18).
- [23] 扈红英,张俊侨.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结构变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J].宁夏社会科学,2018,(1).
- [24] 邹丽娟,赵玲.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逻辑[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
- [25] 吕朝辉.合力治边:助推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略[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26] 方盛举.边疆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文化戍边方略[J].思想战线,2019,(6).
- [27]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 [28] 郝亚明.民族互嵌型社区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理论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 [29]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1999.
- [30] 陈建樾.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 [31] 习近平.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6-24(01).
- [32]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J].国际经济评论,2019,(5).
- [33] 赵磊.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点与影响[J].当代世界,2021,(2).
- [34]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09(02).
- [35] 孙保全.论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

(责任编辑:潘光繁) (责任校对:任艳 郑首艳)